



略论 20 世纪 50—60 年代 上海的倒流人口问题及其处理

邱国盛

〔摘要〕新中国建立以后,为解决城市人口失业问题、对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推动重工业化发展,大量上海市民先后被动员回乡。但是,对乡村生活的不适应及城乡间的巨大差距又使已回乡的原市民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倒流回上海。为此,上海市先后采取了包括限制粮油供应、减少就业渠道以及救济、补助等各种方式来解决倒流人口问题。倒流人口问题的较好解决,不仅保证了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迁移被局限于国家控制的范围之内,同时更保证了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顺利推进。

〔关键词〕上海;城市建设;人口倒流;人口遣返

〔作者简介〕邱国盛,1969 年生,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4)。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1)03-0145-06

新中国成立以后,受特殊历史背景的影响,中国各地都频繁发生大量城市人口返乡(下乡)的逆城市化现象,并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初。^①就 1965 年以前而言,由于该时期迁往农村者主要为普通市民,加以户籍、粮油、劳动用工等制度尚未完全确立并发挥作用,因而其返乡行为的非政治性(与后来的干部下放、知青上山下乡相较)以及乡村生活的不适应、城乡差距的日益拉大等又使这些以原普通市民为主要构成的“外来人口”纷纷倒流回城市,倒流人口亦因而成为文革前中国城市人口中的特殊构成。如何解决倒流人口问题,不仅仅关系到倒流者个人的命运,而且更关系到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成败。本文拟以上海为例,对目前学术界关注较少的城市倒流人口问题及其解决作一简略的探讨,以期能对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及其特征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动员、遣送与城市人口的返乡

为了将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转变为社会主义新城市,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便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城市改造计划。^②为此,一系列的改造措施相继在全国各城市中展开。就刚刚解放的上海而言,最为迫切的举措非“肃清残敌,扫除战争痕迹,恢复市区秩序”莫属。^③因此,作为恢复社会秩序的

重要内容之一,战争期间流沪的灾民、难民便被大规模地疏散返乡。与此同时,长期战乱、物资匮乏、国民党政府撤离上海时对市政基础设施的破坏等都使解放初期的上海充斥着大量的失业、无业市民。而逃离大陆的国民党军队的持续轰炸、封锁又使国家有限的救济难以安抚众多惶恐不安的失业、无业市民。为此,中共华东局指示上海“对一切失业及无业的市民,不能采取就地维持的消极办法,而应采取疏散回乡生产的积极方针”^④。按照华东局的指示与安排,到 1949 年 8 月底,全市共疏散了灾民、难民及失业、无业市民达 40 余万人之多。^⑤

随着经济、社会秩序的逐渐恢复,到 1950 年中,上海市大规模的人口遣返工作逐渐告一段落。尽管经济形势的好转使带有强迫性质的疏散于此时被搁置,但是,“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这一城市发展指导方针于 1950 年在全国各地的普遍贯彻使上海市以“动员”为主要方式的城市居民返乡工作于此后被提上议事日程。如果说解放初的两三个月中对外地灾民、难民和失业、无业市民的疏散尚属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的话,那么之后对于城市居民的动员则是一个长期的连续的过程。

1950 年 10 月以后,为了“帮助贫苦市民从生产中来解决自己生活问题”,上海市开始对他们进行“动员回乡”^⑥。最开始动员返乡的城市居民首先是

① 有关当代中国逆城市化的现象及其原因分析,可参见拙文《当代中国逆城市化研究(1949—1978)》,《社会科学辑刊》2006 年第 3 期。

② 就当时的城市改造目标,有学者总结说:“中国的新领导人要把城市改成……稳定的、侧重生产的、平均主义的、斯巴达式简朴的、高度组织化的、紧密结合的、有经济保障的、且犯罪、腐败、失业和其他罪恶较少的城市。”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773 页。



已失业较久的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其他的于建国前夕不久来城市的无业市民。有鉴于他们本身的生活较为困难,为了使他们的返乡能够顺利成行,上海市还制定了相应的资助政策。^①应该说,直到1955年,上海市的动员市民返乡工作都在阻力较小的情况下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一方面是因为市民本身在城市的生活困难使他们愿意通过返乡来改变生存的困境,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动员对象大多属于第一代移民,与原籍之间尚有相当的联系,加以南方农村都在普遍地实行土改,返乡之后能够很快获得土地、房屋等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因而容易安置。因此,一经动员,很多失业、无业的市民即主动配合回乡。仅1954年的7、8两月,上海市动员回乡的市民即达30多万人。^②据统计,从1951年到1954年,上海市迁往农村的人口数共计875603人。^③

但是,1955年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恢复,尤其是重内地、轻沿海策略的调整,^④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上海的生产、生活条件都较之前得到很大的改善,不仅失业问题已较好地解决,而且粮、油等生活资料的供应也都能够得到较为充足的保证。因此,此时的城市居民已无返乡的内在需要,而城乡生活条件的差距拉大使1955年以后的城市居民越来越不愿意离开城市,但是,作为国家工业化和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的重要实施内容,人口紧缩与外迁一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城市人口发展的基本走向。为此,上海市的动员工作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是以“单位”为渠道,扩大迁移的范围,不仅将部分工厂、企业和学校迁往内地,而且广泛动员工人参加全国各地重点建设以及动员服务性行业职工参加全国各地重点建设。^⑤二是以居民委员会为渠道,动员临时工、职工家属、走街串巷的小商贩等非单位的城市居民返乡,在这一过程中,居委会同单位一样被要求要“充分发挥作用”^⑥。动员工作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从1955年秋至1956年10月,仅江苏一省,由上海等市动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市民的数量即达40万。^⑦

1960年以后,受大跃进运动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上海市的人口精简工作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为了克服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以及其他原因所造成的国家经济困难,为了调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为了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党的八届十中

全会仍然将继续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作为此后城市工作的重要任务,上海市亦提出1962—1963年精简城镇人口30万人的计划。^⑧“为了保证完成精简任务”,上海市“除了坚决动员为数极少的19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回乡,辞退一部分1958年以后进厂的临时工、里弄工(主要是职工家属)”而外,还不得不“动员一部分老弱职工退休、退职以及动员一部分有条件回乡的老职工退职回乡参加农业生产”^⑨。因此,尽管并不情愿,但1961年以后上海市以企业职工及其家属为主体的城市居民也被大量精简回乡。其中,仅1962年一年,上海市便精简企业职工35万人。^⑩经过1961年至1964年的人口精简,到1965年为止,上海市的人口共迁出160余万,净迁出76万人。^⑪

二、乡村境遇与倒流回城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主动返乡还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的并不情愿,上海市仍有数十万计的居民先后离开城市,回到农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回到农村后便能安心于农村的生产、生活。事实上,回乡者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在回乡后不久便私自重新回到上海,并长期滞留,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上海城市中的特殊人群,即“倒流人口”。

上海市的倒流人口问题,于1955年时便已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来。据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人口办公室的重点调查,全市14个区的58个居民委员会在该年7、8月份共动员回乡9998人,其中有204人倒流回沪,占动员回乡人口总数的2.04%。^⑫较之零星动员回乡者的倒流而言,由政府集体组织到外地垦荒的垦民倒流的规模则更大,如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从江西倒流回上海的垦民便达7700多人。^⑬这些倒流人口成为当时由乡村流入上海城市的外来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上海市于1956年底对普陀、杨浦等9个较为集中的区点和面的调查统计,9449名外来人口中,倒流人口共计3297人,占34.89%。^⑭到60年代初,随企业、学校等企事业单位集体外迁而倒流回沪者的数量也日益增加。据统计,到1963年5月底,上海共有支内倒流人口22399人。其中,外地清洗开革和自动离职的4309人,外地

①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规定:“凡属本市失业工人,经总工会或所属工会证明确属无力返乡者得发给路粮车船票一部或全部资助回乡生产。”上档档案:B1-2-492。

② 1956年以后,随着军事威胁因素的逐渐缓和,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应该“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之后,上海市也确立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发展方针。参见孙怀仁主编:《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198—199页。



精简和退职退学的 5622 人,在外地落户后自动跑回或经当地同意迁回的职工及家属等 8948 人。此三类占全部支内倒流人口总数的 84%。^[17]

已经返乡的原城市居民中,之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安心于农村的生产、生活,在返乡后不久即自行从农村倒流回上海,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恋乡情结下的故土难离,而更与当时城乡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

从乡村的角度看,乡村的陌生环境与资源紧张使回乡者的生存条件在 1955 年以后变得更加艰难。其主要原因,此时的农村已开始组织农业高级社,农村人口与其所拥有土地数量的关系也已初步确定下来,因此,动员回乡人口的加入必然意味着乡村人均土地的减少。由于中国的农村,尤其是江南农村早在明清时期便已因人口过多、土地资源严重不足而陷入高水平平衡陷阱^[18],回乡者的增加同时就意味着对乡村人口生存资源的挤压,因而必然招致乡村人口的反对,根据倒流回沪者的讲述:“乡下干部和农民对上海回来的采取歧视的态度,称他们为‘上海客’。工分多的不让他们干,工分少的和难做的如要跑十几里路去干活等才给他们干。”^[19]还有的农村认为,在举办农村合作社时,农民皆有土地、牲畜等财物入股,进行了前期投入。而这些新回来的上海人却没有作任何贡献,却获取相同的收益。以此举有违公平,因此,上海亲属给这些回乡农民的汇款“要先得经过合作社硬扣除部分作为股金”^[20]。与此同时,由于回乡者长期生活在城市,已疏于农业生产,因而刚开始回乡时难以适应农业劳动的生活,收入很低。如有提篮桥区的倒流农民便反映,因他们对农业的不熟悉,在乡所得工资过少,因而“一般的每天劳动只可拿到三、四个工分……不能维持生活”^[21]。但是,当时的农村却缺乏基本的社会救济与保障体系,因而回乡农民在生活陷于困境之后难以得到必要的救济,这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倒流回上海。如原上海划子船工会主席杨凤琴,在响应政府号召带一家八口还乡之后,却因为所分得粮食不够吃而陷入困境,其妻子倒流回上海之后便反映“回乡去受尽苦,饿了三天无人关心,积极的不如落后的好”。另有王锦富在回乡后因生活困难,要求合作社救济,但却遭到拒绝,称“有困难你们自己想办法”、“饿死也活该”,从而使他气愤不过倒流回沪,“谈起此事还泪流不止,表示不愿意再回乡”^[22]。

从城市的角度看,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后,上海市已逐渐走出了建国前夕的经济凋敝状态,尤其是 1953 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作为主要工业基地的上海市不仅轻、重工业皆获得快速发展,而且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主要工业产品成倍增长。^[23]工业生产的发展使上海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强大能力再一次得到体现。据统计,从 1950 年到 1956 年,上海市新参加工作的单位职工共计 47.9 万人,其中原为农民者 6.23 万人,占 13%^[24]。由此而带动的相关就业机会更是成倍地增长,据上海市 1956 年 8 月份的估计,当时全部农村来的农民约七八万人。来到上海的农民还反映说江苏泰县高港每天有几千人排队买船票来上海。^[25]城市经济的好转与城乡差距的逐渐拉开更对原居住在上海的回乡农民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如有的倒流人口便指出:“在乡下种田挣钱不容易,一个劳动日只有五角三分,要做上二天。在上海光二个小孩拾垃圾一天就能收入六角,讨饭也能讨到大白米,小菜场上还能拾到鱼头、菜皮,又能做做小生意、临时工,生活很可以。”^[26]很多重新倒流回上海的人认为:“宁可在上海做狗熊,不到乡下当英雄”,甚至有人说:“宁可死在上海也不愿再回去了。”^[27]

当然,倒流的原因并非仅以上两点,还有如一部分职工家属在被动员回农村之后,由于“夫妻子女两地居住不但开销大,而且不能彼此照顾,影响生产和工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有工人为此而写信给《劳动报》责问:“这个家庭既是没有幸福(夫妻不能团圆),法律是否允许他们离婚。”^[28]这种非经济因素的倒流在全部倒流人口中仍占有一定的比例。

经过大跃进运动以及 1959 年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城市生活物资供应的相对稳定与乡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恶化使 1961 年以后被精简回乡的职工在思想上也更加不稳定。这一方面是因为经过自然灾害后的乡村因生存资源的紧张而消极对待回乡人员的安置^①,另一方面也因为城乡差距的拉大使返乡人员更面临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力。如奉贤县 1963 年离婚案件比 1962 年增加 60%,究其原因,“多数由于回乡后经济收入减少,妻子不满而寻衅吵闹”^[29]。在严重的家庭纠纷中,有的回乡职工甚至因而自杀。为此,相当一部分回乡、下乡人员都表现出“思想不稳

① 如川沙县北蔡公社在面对回乡人员安置任务时,有的生产队以“土地少,不缺劳动力,安置回乡人员要影响收入”,“口粮不好解决”等为借口而婉拒,有的生产队则公开拒绝。此外,又有部分生产队社员认为接收回乡人员是“救了田鸡饿死蛇”。参见上海市委农村工作部精简小组:《川沙县北蔡公社安置回乡人员工作情况》(1963 年 8 月 10 日),上档档案:A69-2-166。



定,不安心农业生产”的情绪,如上海县龙华公社回乡职工费国余,每天早上面对泰山耐火材料厂数烟囱,叹气讲:“回乡时只有一根烟囱冒烟,今日已有五根冒烟,何时我能回厂。”^[30]类似于费国余者并非少数。据调查,在上海郊区8个县的回乡、下乡人员中,严重不安心的约占10%左右,思想不够稳定的约占50%左右。^[31]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严重不安心”者私自返回城市,有的“倒流市区,赖在厂里不走”,有的甚至“还上北京‘告状’”^[32]。

三、倒流人口问题的解决

尽管倒流回沪者仅仅是全部返乡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但是由于他们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无论是从个人的情感认同看,还是从其早已建立起来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络看,倒流回上海的人口都比那些刚刚离开乡村而进入城市的外来者拥有更加“名正言顺”的返城理由。但是,个人对城市的强烈渴望并不意味着城市对他们的必然接纳。相反,“外来人口”的定位使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注定将充满曲折,而且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他们在城市中的生存空间也必然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新型城乡关系,大力促进城乡交流,加以“一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必然导致的“资本排斥劳力”现象的出现仍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因而1956年以前,国家并未限制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对于原籍无生产、生活条件而倒流回沪者,一经调查属实,上海市则给予恢复户口;原籍仅有暂时困难的倒流者,亦给予报进一定期限的临时户口(实际上,在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上海的长期临时户口)。^[33]因此,倒流者在回到上海以后,无论是生活还是就业问题,在当时都还不存在明显障碍。有鉴于此,上海市人口委员会认为,直至1955年底,“上海仍为随便可居之地”^[34]。

但是,1956年以后,受全国范围内过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影响,再加上自然灾害,全国许多省份都出现了大面积的粮食歉收,农村面临严峻的生存困境。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包括倒流人口在内的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等省包括农民、复员军人以及许多乡、社干部在内的农村人口都纷纷流向城市。就上海而言,由江苏、浙江、安徽等省流入上海“渡荒谋生”的农村人口尤众,从而给上海“在居住、交通、供应等方面带来不少困难”^[35]。因此,配合中央所发出的《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上海市亦于1956年12月13日发布了《关于处理和防止外地人口流入本市

证符合入户条件的推迟办理,甚至把户口冻结起来。1957年1月,上海市又颁布《关于加强处理和防止外地人口流入本市的通知》从劳动用工和粮油供应等方面进行限制。在劳动用工方面,规定凡工厂企业招用外地人员,应经劳动部门批准,并且1957年全市不增加新的职工和工作人员,各机关、工厂、企业确需要添人,由劳动等有关部门在现有职工和工作人员中调整。在粮油供应方面,规定除未登记户口者不供应粮食外,对于已登记为临时户口者除带有全国通用粮票外一般也不供应粮食,并要求粮食部门“根据粮食供应制度对粮票严格加以控制”^[36]。

在这样一种新的背景之下,倒流者在上海的生存环境也随之越来越严峻。首先是户口的申报受到日趋严格的限制。按1956年12月《关于处理和防止外地人口流入本市的办法》的规定,凡“属于动员回乡的对象,可暂登记为临时户口,经动员后仍坚决不愿回去的,仍应耐心地说服继续动员,不予转为常住户口,也不供应粮食”。受政策的限制,从1956年底起,倒流人口申报户口的难度开始增大,据1956年底的调查,3297名倒流人口中,已报上常住户口的仅占16.03%,报上临时户口的占62.91%,没有户口的占21.06%。^[37]1957年8月,上海市又进一步规定:“对已经流入本市的外来人口和倒流人口,凡在原籍或原工作地区有生产、生活条件的,一律要坚决动员回原籍或原工作地区生产。”^[38]因此,即便证件齐全,申报正式户口也越来越难,据调查,当时全市持有合法的迁移证件未给报入户口的有近1万人。^[39]

倒流人口的就业渠道也越来越窄。1957年以前,倒流人口在上海的谋生途径还较多,除了正式的工厂招工外,他们还可以在工厂做临时工,或干他们离开上海以前的“老本行”,如修皮鞋、磨剪刀、爆炒米花等等,或者卖杨梅、棒冰做流动摊贩,“生活都能勉强维持”^[40]。另据1957年对江宁、闸北、徐汇等三个区的调查,在778个副食品流动摊贩中,回乡倒流人口即有68人,占其中的21.8%。^[41]但是,1959年以后,国家严格限制单位私自招收职工,甚至到1962年以后,招收临时职工也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42],倒流人口在正式单位就业的渠道因而受阻。其他零散就业形式也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一方面,上海市根据大中小一条边的原则,将尚未完全管起来的零星修建、短途运输、内河装卸等业务实行归口管理,以“堵塞漏洞”^[43],另一方面,又在全市常住居民中组织专业服务队、劳动后备队以及各种里弄服务组织,从而极大地缩小了倒流人口的零散就业机会。^[44]就倒流人口较为集中的摊贩而言,从1957年开始,上海市便要



求工商行政管理局加强对自由市场的管理,防止外地小贩、小商流入。^①1960年以后,受城市人民公社化的影响,无证摊贩被大量取缔。据统计,从1958年到1960年,上海市临时人口中的无证摊贩数从4582个下降到487个。^{〔45〕}1963年以后,由于国家严格限制集市贸易,上海市区集市全面萎缩,摊贩进货源头因而受到限制。与此同时,上海市工商部门又会同公安、地区部门对无证摊贩多次进行集中清理整顿,对具备回原地或回乡的摊贩予以坚决取缔。那些不服从市场管理而又屡教不改的无证摊贩,甚至无理取闹的,由公安局强制执行拘留或其他法律处分。^{〔46〕}由于生存机会的减少,大量倒流人口不得不返回农村。如1960年四、五两月,南市区201名倒流人口摊贩遭取缔后,其中的155人由于在上海已无谋生之途而被迫回乡。^{〔47〕}

此外,1963年以后,针对此时的倒流人口主要为返乡生产的原城市职工这一特殊情况,上海市又采取了多种弥补性措施来阻止其倒流回城:一是对返乡后确实生活有困难者予以切实的救济与补助,其救济的基本原则是“长期困难的定期救济,暂时困难的临时救济”;^{〔48〕}二是为充分运用和发挥回乡、下乡人员在技术、文化上的特长,通过“因人因事,妥善安排生产”的方式安排这些回乡人员搞农业生产以外的其他多种经营;^②三是对那些“品质恶劣,为非作歹、屡迁屡返”,而又在城市从事各种非法活动者,则或由“公安部门送到农场强制劳动或者劳动教养”,或由“民政部门遣送他们回乡、下乡,交由当地社、队加以管教,督促他们好好劳动”。^{〔49〕}四是于1962年底批准了市劳动局所拟订之《上海市企业单位老弱职工子女顶替工作暂行办法》,允许部分老、弱职工子女进城顶替工作。^③通过采取以上措施,上海市因而避免了此前经常出现的返乡者大规模倒流回沪现象的发生。

由以上分析可见,由于1956年以后国家从户籍、劳动就业等方面大力强化管理,被动员返乡的原市民倒流回沪者已越来越少。之后,上海市政府又采取各种措施来避免此后被精简城市职工倒流。因此,1964年以后,长期困扰上海的“倒流人口”问题终于得到较好的解决。^④此后,由于再未以动员普通市民返乡的方式来减少城市人口,因而尽管1966年以后上海的

逆城市化进程并未结束,文革开始以后又有大量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但作为一个群体的“倒流人口”问题再也没有发生。

通过对上海倒流口现象及相关政策结果的分析又可以看出,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在国家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下,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传统的自发城市化模式已完全为官方的制度化渠道所取代,中国的计划型城市化模式最终全面确立。这不仅使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因而处于国家的严格控制范围之内,同时也为以“资本排斥劳动力”为特征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全面贯彻和实施奠定了基础,这是这一时期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保证。

〔参考文献〕

- 〔1〕陈毅:《关于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六、七两月的工作报告》(1949年8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陈毅在上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59页。
- 〔2〕中共华东局关于上海市政府处理失业问题的复电(按:此档无题,笔者代拟此题),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B1,目录号2,案卷号281(以下简称上档档案:B1-2-281)。
- 〔3〕上海市人民政府民政局:《一年来民政工作总结》(1950年5月20日),上档档案:B1-2-268。
- 〔4〕《冬令救济工作讲话参考资料》,上档档案:B2-2-26。
- 〔5〕上海市里弄工作委员会:《关于目前里弄工作情况的报告》(1955年11月20日),上档档案:B2-1-22。
- 〔6〕上海市统计局编:《上海市人口、文教、卫生事业历史资料(1949-1955)》,上档档案:B31-1-29。
- 〔7〕《上海市紧缩人口的参考资料》(1955年),上档档案:B25-2-6。
- 〔8〕《关于动员外来农民回乡生产工作的几项规定》(1955年),上档档案:B25-1-7。
- 〔9〕《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关于继续做好城市回乡农民巩固工作的通知》(1956年10月8日),上档档案:B1-1-1400。
- 〔10〕《关于减少城镇人口——王克同志在市劳动局全体干部大会上的动员报告纪要》(1963年3月29日),上档档案:A69-2-166。
- 〔11〕中共上海市委精简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情况》(1963年2月3日),上档档案:A69-2-165。
- 〔12〕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艰难探索(1956-1965)》,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57页。
- 〔13〕上海社会现状和趋势编写组:《上海社会现状和趋势(1980-1983)》,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页。

① 参见《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关于开展动员农民回乡生产工作的计划》(1957年3月10日),上档档案:B1-1-1412。

② 如川沙县北蔡公社便将961个回乡人员中的127人分别安排从事泥木工、运输、衣服缝制、刺绣以及在生产队做会计等。参见上海市委农村工作部精简小组:《川沙县北蔡公社安置回乡人员工作情况》(1963年8月10日),上档档案:A69-2-166。

③ 仅1963年1—10月,便有380名职工子女顶替进城。参见《上海劳动志》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劳动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61页。

④ 据统计,1965年全上海从农村倒流回沪者仅有2478人。参见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1965年人口年报统计资料汇编》,上档档案:B31-2-1229。



〔14〕《最近回乡农民向上海倒流与在乡农民继续盲目流入上海的情况》(1955年),上档档案:B25-1-7。

〔15〕《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贯彻“处理和防止外地人口流入本市的办法”的指示》(1957年8月2日),上档档案:B1-1-1412。

〔16〕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外来人口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57年1月28日),上档档案:B25-1-7。

〔17〕《关于倒流人口中无证摊贩处理意见的报告》(1963年10月18日),上档档案:B1-2-2871。

〔18〕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12页。

〔19〕上海市民政局:《关于最近职工要求迁来家属和农民大量迁入本市的情况报告和请示》(1957年1月30日),上档档案:B25-1-7。

〔20〕上海市民政局:《关于最近职工要求迁来家属和农民大量迁入本市的情况报告和请示》(1957年1月30日),上档档案:B25-1-7。

〔21〕上海市民政局:《了解有关流入本市农民情况材料一份》(1956年7月26日),上档档案:B1-1-1400。

〔22〕上海市民政局:《了解有关流入本市农民情况材料一份》(1956年7月26日),上档档案:B1-1-1400。

〔23〕孙怀仁:《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5页。

〔24〕上海市统计局编:《上海市国民经济统计提要 1956年》,上海:上海市统计局,1958年,第95页。

〔25〕《关于最近职工要求迁来家属和农民大量迁入本市的情况报告和请示》(1956年8月6日),上档档案:B25-1-7。

〔26〕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外来人口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57年1月28日),上档档案:B25-1-7。

〔27〕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外来人口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57年1月28日),上档档案:B25-1-7。

〔28〕上海市民政局:《关于最近职工要求迁来家属和农民大量迁入本市的情况报告和请示》(1957年1月30日),上档档案:B25-1-7。

〔29〕上海市委农村工作部精简小组:《上海市郊区检查访问回乡下乡人员安置工作情况和意见》(1964年2月11日),上档档案:A69-2-217。

〔30〕上海市委农村工作部精简小组办公室:《上海市郊区检查访问回乡下乡人员安置工作情况和意见》(1964年2月11日),上档档案:A69-2-217。

〔31〕上海市人委农业办公室:《关于郊区对回乡、下乡人员进行检查慰问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64年3月12日),上档档案:A69-2-217。

〔32〕上海市委农村工作部精简小组办公室:《关于郊区回乡人员安置、检查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意见》(1963年10月22日),上档

档案:A69-2-166。

〔33〕《最近回乡农民向上海倒流与在乡农民继续盲目流入上海的情况》(1955年12月16日),上档档案:B25-1-7。

〔34〕《最近回乡农民向上海倒流与在乡农民继续盲目流入上海的情况》(1955年12月16日),上档档案:B25-1-7。

〔35〕《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关于开展动员农民回乡生产工作的计划》(1957年3月10日),上档档案:B1-1-1412。

〔36〕《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关于处理和防止外地人口流入本市的办法》(1956年12月13日),上档档案:B1-1-1400。

〔37〕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外来人口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57年1月28日),上档档案:B25-1-7。

〔38〕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贯彻“处理和防止外地人口流入本市的办法”的指示》(1957年8月2日),上档档案:B1-1-1412。

〔39〕《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当前户口管理工作情况及今后改进意见的请示报告》(1957年8月19日),上档档案:B1-2-1951。

〔40〕上海市民政局:《关于最近职工要求迁来家属和农民大量迁入本市的情况报告和请示》(1957年1月30日),上档档案:B25-1-7。

〔41〕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配合动员农民回乡加强管理流动摊贩及处理申请恢复设摊的意见》(1957年4月26日),上档档案:B2-2-2007。

〔42〕《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使用临时职工的暂行规定》(1962),上档档案:A69-2-82。

〔43〕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市委政治工作部:《关于加强社会劳动力组织管理,制止外地人口盲目流入的请示报告》(1959年12月31日),上档档案:A11-1-34。

〔44〕《关于加强社会劳动力组织管理,制止外地人口盲目流入的请示报告》(1959年12月31日),上档档案:A11-1-34。

〔45〕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劳动局编:《上海市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人口、劳动工资、职工生活):1957-1960年》,第6页,上档档案:B31-1-52。

〔46〕《关于倒流人口中无证摊贩处理意见的报告》(1963年10月18日),上档档案:B1-2-2871。

〔47〕上海市南市区区委:《关于取缔无证摊贩问题》(1960年7月),上档档案:A20-1-14。

〔48〕上海市委农村工作部精简小组办公室:《关于郊区回乡人员安置、检查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意见》(1963年10月22日),上档档案:A69-2-166。

〔49〕中共上海市委精简小组办公室:《关于个别回乡下乡倒流人员无理取闹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1964年1月24日),上档档案:A69-2-217。

【责任编辑:陈志刚】